

形訛改讀試探^{*}

蕭 峰

（岳陽）湖南理工學院中國語言文學院

摘要

形訛改讀相對於音隨形變和望形生音，是一種新提法，這一現象值得深入闡發之處不少：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類型、特點、性質和生成機制，考釋途徑與方法等。

關鍵字：形訛改讀；音隨形變；望形生音

^{*} 本文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康熙字典》形訛改讀研究（20BYY129）、湖南省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課題：中國古代字書訛字改讀研究（XSP20YBZ092）階段性成果，感謝《中國文字》匿名評審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

The Analysis of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ms (形訛改讀)

Xiao Feng

(Yuey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ompare with Pronunciation Changing on Deformation (音隨形變) and Reading Changing on character pattern (望形生音),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ms (形訛改讀) is new nomenclature. So this phenomenon is worthy of further formulation: Conception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category, characteristic, character, formation mechanism, way of textual research and method.

Keyword: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Pronunciation Changing on Deformation, Reading Changing on character pattern

一 形訛改讀及學史梳理

形訛改讀，又稱「音隨形變」，「文字的演變過程中，隨著書寫形式的變化，語音也會發生相應變化，有時甚至會變得跟原來的讀音毫無相同之處。」，「這種同一個字因為字形的訛變導致讀音變化的語言現象，我們稱之為音隨形變；這種變化後的讀音稱為俗音或俗讀。」¹

有時作形變音改。見楊寶忠《論隱性疑難俗字》，「字形變易，導致原有構形理據遭到破壞，字書編寫者不去探究俗字形體之來歷，往往改變字音以遷就字形。」²

又作音隨形變。張湧泉認為該術語來自酈道元「音隨字變」，儘管所指稱的現象存在比較大的差別。據查，首次用這一術語指稱這一現象的，當為清代的桂馥，他在《說文解字義證》「焉」下云：「焉聲者，焉當為烏。《酈注》所謂『鄔澤也』。《廣韻》：『滂，水滂。』《集韻》：『滂，水名。』篆訛從焉，音隨形變，讀『乙幹切』，實應讀『安古切』。酈引本書原作滂，後人據誤本《說文》改為焉。」³不過，「望形生音」的提法，始於張湧泉，而「形變音改」則始於楊寶忠。

理論探討方面。目前僅見張湧泉的《論音隨形變》。該文在概念界定、學史梳理基礎上就其價值等進行較深入闡發，限於篇幅，沒有充分展開。

單字考釋方面。張湧泉《漢語俗字叢考》、鄭賢章《漢文佛典疑難俗字匯釋與研究》、蔡夢麒師《〈廣韻〉校釋》、曾良《敦煌文獻叢筭》等多有涉及，梁春勝、熊加全、柳建鈺等也有一些零散考釋。

楊寶忠「疑難字考釋」系列在形訛改讀研究上，將理論闡發與單字考釋有機結合起來。他在考釋這一類型現象的每個字時，有相關理論總結，在描寫字形訛變方面非常細緻，考釋方法也靈活多樣。

以上所有研究為進一步理論探討總結打下了堅實基礎，也為文字考釋提供很多經典範例。但總體來說，還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一是術語與現象的名實不太相符，二是在理論闡發上還可以做得更深入。


從清桂馥、王筠⁴，到張、楊諸先生相關著述來看，使用這三個術語所指稱

¹ 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嶽麓書社，1995年），頁368、369。

² 楊寶忠：《論隱性疑難俗字》《河北大學學報》第3期（2013年5月）。

³ 〔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960。

⁴ 〔清〕王筠《說文解字句讀》在「焉」等下亦引桂馥說，云「音隨形變」（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427。

的都是同一現象，即漢字在傳抄過程中形體發生訛變導致原有構形理據和表音功能喪失，引起不規則的改讀現象。這一現象應該是一個動態過程。從字形來看，有一個從不訛到訛變的過程。從讀音來看，有一個從原讀到改讀的過程。任何一個形訛改讀字至少包含這兩個過程，也內在地要包含有四個不同的要素：未訛形、訛形，原讀音、改讀音。比如「舅」與「甥」。字形由「舅」（《說文》正篆作)，《玉篇》隸定作「甥」）變作「甥」，有一個由構件「臼」訛作「白」的過程，而讀音則相應地由《玉篇》「巨久切」改讀為《龍龕手鏡》的「音男」。⁵相反，如果這兩個過程缺少其中一個，或者四個要素中缺少其中一個，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形訛改讀。這是判別兩個漢字是否是形訛改讀的最重要條件。

以此為準來看音隨形變。從相關著述來看，張湧泉、楊寶忠等對這一現象把握相當精準，所舉例字沒有超出這一範圍，但少部分學者往往只從概念的字面意義出發作理解，容易將不屬於這一現象的相關字例納入其中，如用以指稱一些字形不訛，只是表音構件替換而語音又是音系性演變的現象。如「𧈧」和「𧈩」字，在佛經用字方面，從字形上看是偏旁置換，不屬形訛，而聲符「元」與「兀」，在讀音上亦屬於語音系統上有規律的發展演變。⁶

望形生音問題可能更大。一是容易與日常用法相混。望形生音的日常用法是指讀白字，即讀字讀半邊。由於語音發生變化，有些字作為整個漢字與表音構件之間發生語音疏離，在現代讀音裡不一樣，但有些人在認讀時依然按作為整個漢字的讀音來讀。這就跟形訛改讀有區別了。讀白字從語音來講，往往是音系性演變；從字形來看，沒有發生形體訛變。如「𧈩」，如果依照讀字讀半邊的方法，讀rǔ。這種錯誤的讀法就是望形生音，但卻不是形訛改讀：從理論上分析，字形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更談不上訛變。從語音上看，「𧈩」、「辱」韻部上古在屋部，⁷「𧈩」上古屬泥母，「辱」屬日母，讀音其實非常接近。⁸《廣韻·入聲·三燭》：「辱，而蜀切」，《廣韻·入聲·二沃》：「𧈩，內沃切」。兩字的聲韻由於語音發展演變，有了較明顯區分，現代漢語讀音基本承襲了中古這種音韻區分格局，是語音演變長期累積的結果。所以這種變化是一種音系性的演變，不是一種

⁵ 詳參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嶽麓書社，1995年），頁368、369。

⁶ 關於「𧈩」和「𧈩」是否屬於音隨形變，在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微信群裡，不同學者有不同看法。這只用來說明該術語容易引起誤解，並非指這種誤解出現在相關論文中。

⁷ 王力：《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二冊，頁680。

⁸ 章太炎認為「日母歸泥母」，雖然不少學者如王力等不太同意，將泥母構擬成[n]，日母作[nʅ]，但我們認為是還是有一定道理：部分日母字如「日」，在湖南邵陽方言裡，作為底層語音，讀[n]，如「生日」的「日」，讀[ni]輕聲；太陽念「日頭」，讀[nian]¹⁵，與泥母字沒區別。

不規則的改讀，與形訛改讀有本質上的區別。從實際應用上講，這種讀音沒有得到社會的認可，也沒得到辭書的認可。但形訛改讀往往通過辭書的收錄得到社會的認可。從概念的外延上講，該術語不僅可以指稱形訛改讀，還可以指稱形訛改讀以外的讀白字，外延過大。而從內含上講，望形生音字面上的語義還不能完全概括現象所含有的所有內容。望形生音只是從靜態角度對這一現象的最後結果作出概括，即針對已訛字形和改讀字音進行概括。沒有將未訛字形及原讀音涵蓋進來。

綜上所述，不論是音隨形變還是望形生音，術語的語義涵蓋面小，但概念的外延則又相對偏大。由於形變音改這一術語使用較少，我們認為，形訛改讀才名副其實。

二 形訛改讀的類型、特點、性質和生成機制

前人在形訛改讀上，有不少理論闡發，成系統的見於張湧泉的《論音隨形變》，其他雖然也涉及到這一現象的方方面面，但相對零散，我們在研讀相關著述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學習心得，分別從形訛改讀的類型、特點、性質和生成機制等方面對其作些歸納總結。

關於形訛改讀類型。參照詞語引申方式，形訛改讀可以分為鏈條式、輻射式。鏈條式指的是以原字為起點，字形發生連續訛變，後一次形訛均以前一次字形為基礎，讀音在形訛牽動下發生改變的現象。輻射式指的是以原字為中心，按不同方向發生形訛，每個形訛字都發生讀音改變現象。

鏈條式又分三類，即單次訛改、連訛單改、連訛連改，分述如下。

所謂單次訛改，就是指原字與訛字之間，只發生一次形訛，也只出現一次改讀。這種情況最常見。上文「舅」與「甥」等即屬此類。


所謂連訛單改，就是指原字與訛字之間，發生了兩次或以上形訛，但只出現一次改讀。如「忸」與「忸」、「忸」、「恆」的關係，即屬此類。⁹《康熙字典》：「忸，《廣韻》《集韻》並彌鄰切，音民。」故宮本《王韻》莫奔反：「忸忸，不俺。」「彌鄰切」與「莫奔反」同。《玉篇》：「忸，都替切，悶也」。《龍龕》：「恆，音帝，悶也」，「都替切」即與「帝」音同。「忸」訛作「忸」，又訛作「忸」「恆」，字形連續訛變三次，而音則只由「彌鄰切」改讀作「都替切」，僅改讀一次。



⁹ 楊寶忠：《疑難字考釋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65。

所謂連訛連改，就是指原字連續訛變成兩個以上字形，每個字形都有一個與原讀沒有任何聯繫的讀音現象。如，「弜」與「𢇛」、「𢇛」。¹⁰《說文》「弜，強也，其兩切」。《玉篇》：「𢇛，之忍切，弓強。」《玉篇》：「𢇛，巨勿切，音掘，強勇。」，「弜」先訛作「𢇛」，音改讀為「之忍切」，實際以右半「弓」之訛形「臣」為聲符。再訛作「𢇛」，再改讀為「巨勿切」，實際以訛形構件「臣」之訛「巨」為聲符。這兩次形訛，在形訛構件的影響下，讀音也發生相應不規則變化。

輻射式，如「稭」，《說文》：「布之八十縷為稭，从禾𦏧聲。子紅切。」段注云：「蓋必云『禾四十秉為稭，从禾𦏧聲。一曰：布之八十縷為稭』。轉寫奪漏而亂之耳。」訛作「稭」，《玉篇》：「須閏切，秉四謂之莒，莒十謂之稭。」又訛作「稭」，《字彙》：「於尤切，音攸。把謂之秉，秉四曰莒，莒十曰稭。」查《廣雅》：「莒十曰稭」。曹憲於「稭」下注云「子公」。明此當作「稭」，則「稭」、「稭」皆訛，而音「須閏切」、「於尤切」為改讀，誤將「稭」、「稭」之構件「𦏧」、「憂」作為聲符。它如「𦏧」本「子紅切」，訛作「𦏧」，則音「即」。又訛作「𦏧」，則「烏賄切」，皆是。¹¹

關於形訛改讀產生原因。分兩方面討論，即形訛的成因和改讀的成因。形訛的原因，楊寶忠「疑難字考釋」系列有很好的闡發，不過散見於單字考釋之中，沒有進行概括歸納。總的說來，主要有筆劃的點線互混、結構的拆並重組、因刊刻不精或紙張破損而字跡模糊或殘泐導致漢字筆劃部件缺失等¹²。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形訛，是由於不同書體層疊導致訛混。《康熙字典》：「蠹，田黎切」，《類篇》《集韻》作「蠹」。又《類篇》「蠹，莫交切」，「又迷浮切」。「蠹，迷浮切」。

「蠹」、「蠹」、「蠹」、「蠹」、「蠹」，當為一字。「蠹」篆作，上所从之「𧈧」，

是作為聲符（作為構件與小篆稍異）的隸古定，其字形是「矛」字的篆形寫法，在其上加「艸」則為𦏧，與今隸「茅」當為一字。進入到隸楷系統後，則與「第」字形近相混，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形訛。改讀的成因，最主要還在於漢字所特有的形聲相配。漢字形聲字占絕對優勢，且聲符表聲是其最重要特點。每個漢字在形義匹配原則指導下，排除其不是象形、指事和會意的前提下，則當屬形聲。在形聲相配原則指導下，確定其聲符，最後依該訛字聲符再確定其讀音。

¹⁰ 楊寶忠：《疑難字考釋與研究》，頁316。

¹¹ 楊寶忠：《疑難字考釋與研究》，頁217、218。

¹² 楊寶忠《疑難字考釋與研究》一書談疑難字來源時，認為字形訛變產生的原因包括傳抄失誤、轉錄失真、楷正失誤和失於束縛等四個方面，這是從另一個角度討論。

由於原有構形理據喪失，形聲符發生變化，讀音也隨之發生變化。上文各字由「弔」變弔，再訛作「第」（第），則由「莫浮切」改讀「田黎切」。

關於形訛改讀的特點。與形訛不改讀及非形訛改讀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相同處：與形訛不改讀相比，相同處就是字形都會發生訛變，這些變化也都會遵循形訛的基本規律。但形訛改讀讀音要發生相應改變，而後者不發生語音變化。與非形訛改讀相比，形訛改讀字形必須發生變化，而後者則在字形上不發生變化，或者這種變化不屬於形體訛變，而是循化。非形訛改讀的讀音的變化屬於語音系統的正常演變，而不是形單影隻地不規則變化。具體說來，形訛改讀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特點。

一是變化不規則性。形為訛化，音為不規則變化。所謂訛化，是相對於循化而言的。循化是字形的演變從整體及其部件來看，都是有規律的、始終未曾與字義脫離聯繫的，不改變其部件與基本字義間的聯繫的變化。而訛化則字的形體發展脫離了造字本義的變化。¹³每個形訛改讀字，與原字相比，其構形理據發生了根本性改讀，無法以原字的構形理據進行分析。如「獫」，《爾雅·釋畜》：「犬生三，獫。」《玉篇》：「獫，子公切，犬生三子也。」，「獫，音即，犬生三子。」胡吉宣¹⁴、楊寶忠認為，「獫」當為「獫」之形訛，至確。「獫」為「犬生三」。《說文》：「縱，生六月豚。从豕从聲。一曰一歲縱，尚叢聚也。」段注云：「疊韻為訓。」意即「縱」與「叢」聲近義同。「獫」與「縱」聲近義同，皆得義於「叢聚」。「獫」非但與「縱」聲近義同，其亦得聲義於「𤝵」，《說文》：「𤝵，斂足也。」「斂足」即有「總聚」義。从「𤝵」得聲之字，多有「叢聚」義。「獫」「𤝵」「𤝵」「𤝵」「𤝵」等，「凡言𤝵者。皆聚之義也。」¹⁵而「獫」及从「𤝵」得聲之字，多無聚義。「犬生三子」，即有「叢聚」義。「獫」从「𤝵」有「聚」義，其形義可說，而「獫」从「𤝵」得聲而有「聚」義，其形義不可說，則形訛不言自明。此外，「獫」為「子紅切」，轉而讀為「音即」，兩者古今讀音上沒有嚴整的對應關係，則可判定為不規則變化。

二是變化合規則性。從字形上看，字形訛變符合漢字發展演變的總體規律，這是與其他類型字形訛變的共性。從讀音來看，它要遵循形音匹配原則，即音讀受其表音構件的制約，以上諸例均是。反觀形訛不改讀，反而不符合形聲匹配原則。如「弔」即「弔」字之訛，《龍龕手鏡》：「之忍反，弓強也。」《正字通》：「弔

¹³ 劉翔、陳抗、陳初生、董琨：《商周古文字讀本》（北京：語文出版社，1989年），頁253、254。

¹⁴ 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4554。

¹⁵ 王念孫：《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三下，頁6。

字之訛。舊注音義與弰同，重出，从弰為正。」《康熙字典》同。「弰」从「弓」从「巳」，義為「弓強」，从「弓」可說，从「巳」不可說，不當為會意，當以「巳」為聲。「之忍切」與「巳」語音沒有關聯，而與「弰」的聲符「臣」讀音有關聯。換言之，訛字「弰」讀「之忍切」符合形聲相配原則，而「弰」則不符合形聲相配原則。另如「斫」，《字彙補》：「口戈切，音科，見《字辨》。」《康熙字典》列入備考，云：「《龍龕》音科。」《龍龕手鏡》：「**𣎵**，舊藏作科。」楊寶忠認為即為「科」字之訛，可從。¹⁶則「斫」字之「斤」無法與「科」音義相聯繫，不符合形聲相配原則。其他形訛而不改讀的均無法將其讀音與相關漢字的構件聯繫起來。非形訛的改讀遵循語音發展演變規律，上文所舉「耨」字，文字字形一直以來沒有改變，但語音從聲母到韻母都發生相應改變。站在現代角度，它不符合形聲相配原則，但站在造字之初，則符合形聲相配原則。因此，非形訛改讀雖然其變化合規則性，但與形訛改讀遵循的規則有異。

關於形訛改讀的性質。通過形訛不改讀與非形訛改讀比較來確立。本質上，形訛不改讀與非形訛改讀都體現出語言對文字的約束作用，而訛字改讀先是字形訛變，牽動語音發生不規則改變，則體現出文字對語言反作用的影響。形訛是文字問題，改讀是語音問題。因此不是純粹文字問題，也不是單純的語言問題，而是文字與語言相互影響問題。

普通語言學理論認為文字從屬於語言，記錄語音，語音發生改變，文字就要發生相應改變。語言與文字的關係非常複雜。我們首先要承認普通語言學理論的相關結論，漢字與漢語語音的關係，語音為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漢字存在大量的假借字。二是語音發生變化，文字有可能發生相應變化。比如「鑒」改為「鏡」字。三是形訛並非一定要產生改讀，如上例所舉「弰」、「斫」，等。同時，文字並非完全從屬於語言，有自己相對的獨立性。這一特點不僅表現在語音發生改變，漢字依然可以不發生變化外，還表現在文字在結構上發生改變，在一定程度和範圍上牽動語言發生相應改變，即形訛改讀現象。

總之，認清形訛改讀的性質，可以更清楚地認識漢字區別於其它文字所特有的特徵：文字形音義結合非常緊密，可以相互影響。認清其特點，可以更有效區分非形訛改讀與形訛不改讀等現象。認清其類型，可以更好地把握形訛改讀的演進過程，無論總體趨勢還是個例演進。

理論探討還有其他方面，如訛字改讀的材料來源、訛字改讀的書體和語音層次，等，將另文展開。

¹⁶ 楊寶忠：《疑難字續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9、20。

三 形訛改讀考釋方法與實踐

形訛改讀所探討的是字形如何發展演變，屬循變還是訛變，讀音改變是音系性演變還是不規則改讀，字形訛變與字音改讀在時間上是同時發生還是有先有後，誰先誰後等一系列問題。形訛改讀，其根本原因在於原有構形理據喪失，這就意味著訛字已形成了新的構形理據，這為訛後形成另一個「新詞」創造了條件，表現在語音上，為新的讀音的產生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基礎。原有表音功能喪失，導致與原有讀音失去聯繫，讓其徹底成為了「另一個詞」。如「涵」、「丞」本為一字，讀hán。由於「丞」非象形、指事和會意，則當屬「形聲」，依其「聲符」、「丞」，則當讀chéng，這是情理之中的事。這樣，就導致「丞」字脫離了與「涵」的聯繫獨立成為一個「新詞」。由於音義與「沈」相近，《正字通》：「俗沈字」，「分為二，非」。又將其與「沈」進行了錯誤的溝通。形訛改讀研究，就是要將兩個看似不相關的字形和讀音重新聯繫起來。已經看似各自獨立的詞，通過堅實的書證，包括義訓書證和用例書證，尤其是後者，將其有效溝通起來。

形訛改讀字的考釋，途徑與方法得當，效果更好。綜合當前學界通行做法，近代漢字界通行辨識途徑，辭書方面主要為辭書比照等；文獻方面主要借助異文等。古文字界通行考釋方法主要有比照法、偏旁分析法、辭例推勘法等。

由於辭書收錄的文字是漢字各時期的歷史層疊，對其進行考證，需要瞭解熟悉漢字發展的整個進程。當前一些古文字學者對楷書等今體缺乏足夠的關注度，而部分近代漢字學者在古文字形體方面重視度不太夠。綜合運用古代近代文字考釋方法，恪守乾嘉以來樸學傳統，使用最新資料檢索手段，注重出土文獻，可能會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有新的發現。¹⁷

古文字字形，多用偏旁分析法，配之以比照法與辭例推勘法。由於隸變以前，古文字形義關係相對清晰，加上文獻多湮滅，辭例推勘法難以有用武之地，用偏旁分析法往往可以收到一定的功效。如《廣雅·卷三上》「擄、擗、戕、擿，投也。扞」條。其中的「戕」字，不見於後世辭書。王氏疏云：「戕字音義未詳，曹憲音內有「本作郟，未詳，弋音」七字。」又云：「戕與戕，字相似。」「𠂔與戕，字亦相似，未知誰是《廣雅》原文。」












¹⁷ 林志強教授主持的「傳抄古文資料全編與傳抄古文研究」，將傳抄古文的篆體古文與隸楷古文做了全面整理，並詳細梳理每個漢字的發展演變序列。形訛改讀研究可以全面借鑑這種貫通古今的做法。

「𡗗」與𡗗，皆為「𡗗」字之訛，而曹憲「音弋」，「弋」當是「戈」字之殘泐，屬形訛改讀。「𡗗」與「𡗗」，所从之「戈」同，不同處在一从「女」，一从「𠂔」，且兩構件位置不同，一在左，一在右。我們可以通過偏旁分析法可以將「𡗗」如何从「𠂔」訛成「女」，最後將其從右移位至左的過程作出詳細描述。「𡗗」，

金文作，其所从之「𠂔」，金文亦有作者，則與金文「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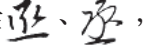



等形近。兩個構件形近而訛混，是可以理解的。當然，有些从「𠂔」的構件，與从「女」相混，還有更為複雜的過程。如「嫗」字由金文到小篆的六個字形，正好相對清晰地描述了兩個構件的訛混過程。



1式為「嫗」字最初之形，从从，2式則在1式基礎上添加，即多了個腳趾。3式「𠂔」下之，變成，略有變形，尚未脫離腳趾之形，還不算訛變。4式則由訛成，即與「女」混。5式則完全脫離形而成為形，即「女」字。而5式與6式的關係，一是構件「𠂔」的減省，二是構件「女」旁的移位。「𠂔」減省的原因可能是由於「𠂔」與「女」皆為人形，於義為複，故可減省。因為从「女」之字，多在左旁，由於形旁類推的關係，「女」旁由右移位至左。因此，馬敘倫認為，「《不嬰敦》亦即『嫗』字」，可從。

再談談讀音。曹憲「音弋」，「弋」實際是「戈」的殘泐。從漢字構造和形聲相配一般原則，「邑」當為形符，則「戈」當為聲符，讀「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¹⁸

¹⁸ 「𡗗」字考釋見拙文：〈廣雅文字筭記〉，《中國文字學報》第九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108年12月），頁191、192。

今文字字形主要採用辭書比照和借助異文。有些在古文字階段沒有發生訛變，而到今文字階段才發生訛變，這種訛變環節在很多辭書和文獻中都有所反映，材料相對豐富得多，因此所採用的考釋方法會有不同，最明顯的就是可以比照辭書和借助異文。如《廣雅·卷一下》有「沒也」條，其中「丞」字，《廣雅疏證》無釋。錢大昭《廣雅疏義》等雖有釋，但未為的話。「丞」當為「涵」字之省訛，「涵」先訛作「丞」，再省作「丞」，各辭書讀「丞」為「辰陵切」，為形訛改讀。首先可以通過辭書比照對該字的來源進行確認。雖然《廣雅》各版本此處皆作「丞」，但《集韻》《類篇》等引《廣雅》皆作「丞」。將《方言·卷十》：「潛、涵，沈也。楚郢以南曰涵，或曰潛。」與《廣雅·卷一下》：「潛、丞、沈，沒也」相比照，對應位置，《方言》作「涵」，可以推斷《廣雅》當作「涵」。其次通過用例書證的異文來確定「丞」、「涵」的關係。《漢語大詞典》僅收「丞濡」一詞，此處四庫全書本作「涵濡」；《明實錄》：「丞養其德性。」批註云：「舊校改丞作涵。」《鈐山堂集》卷三十三《畜德發祥之碑》：「丞泳學海，翱翔文藪。」即化用謝靈運《撰征賦》「羨輕鯁之涵泳，觀翔鷗之落啄」一句。可以佐證「丞泳」即「涵泳」。凡「丞」所出現的地方，「涵」都會出現在相應位置，兩者構成異體關係。當然，從字形發展演變也可以確定「涵」、「丞」的關係，作為構件的「函」與「丞」，在隸書以後尤其是行草階段，容易發生訛混：「丞」字作、，而「函」則作、。王羲之行書「函」字之「匚」與「一」字還能看得出兩者的差別，懷素草書之「函」字則與「丞」字基本相混。從語義上看，「涵」、「丞」兩字的語義完全相同。「涵」、「丞」本為一字，因右邊構件訛為「丞」，在形音匹配原則的牽引下，改讀為「辰陵切」，音「丞」。該字的辭書比照與借助異文在考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字形分析與語義推勘只是起輔助和解釋作用。¹⁹

餘論

由於學力尚淺，這方面研究不夠深入，上文只是對形訛改讀大概情況作了些粗淺的介紹。形訛改讀研究走向更深入，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相關疑難字的考釋是基礎工作，現象歸納和理論闡發必須建立在考釋之上。茲再做總結和補充，條列三點。

¹⁹ 「丞」字考釋見拙文：〈廣雅「丞，沒也」辨正〉，《中國語文》第5期（2020年9月），頁631-633。

考釋實踐方面，有爭議的形訛改讀字認定重證據。證據就是書證。書證是有層次性的，類型和時間不同，對疑難字考釋的支撐力不同。一般說來，義訓書證弱於用例書證，書證時間前於形訛改讀字首見辭書最有力，後於該辭書次之。針對不同形訛與改讀的歷史層次，運用不同的考釋方法，運用不同的書證。

字形發展演變有一般規律：筆劃的點線互混、結構的拆並重組、因刊刻不精或紙張破損而字跡模糊或殘泐導致漢字筆劃部件缺失等。這些規律在傳抄中不同漢字會有不同表現。字音改讀有多種方式。有些受語音發展一般規律的支配，屬於音系性改讀；有些受語義牽動，屬同義換讀；有些字形訛變後，在漢字形聲相配影響下，出現訛字改讀。訛字改讀也有多種類型。

形訛改讀表面上看是形聲相配原則在起作用，但真正起作用的是《說文》在說解中體現出來的形音義匹配思想，這成為我們考訂《說文》及其他辭書一條重要原則，是其他原則和理論的基礎。

參考文獻

- 〔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清〕王筠：《說文解字句讀》，中華書局，1998年。
- 王力：《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二冊。
- 王念孫：《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三下。
- 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嶽麓書社，1995年。
- 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嶽麓書社，1995年。
- 楊寶忠：《疑難字考釋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楊寶忠：《疑難字續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楊寶忠：《論隱性疑難俗字》，《河北大學學報》第3期，2013年5月。
- 劉翔、陳抗、陳初生、董琨：《商周古文字讀本》，北京：語文出版社，1989年。
- 蕭峰：〈廣雅「丞，沒也」辨正〉，《中國語文》第5期，2020年9月。
- 蕭峰：〈廣雅文字筭記〉，《中國文字學報》第九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108年12月。